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视域下数字思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研究

张连云

南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30日

摘要

数字思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既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应然要求, 也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当代运用。本文以该理论为分析框架, 提炼城乡对立的生成与扬弃、旧的分工与人的解放、精神生产的独立性与从属性三个命题, 并将其作为操作性分析工具。研究发现, 数字思政在乡村呈现“赋能”与“固化”并存的效应: 它能够整合优质资源、激活乡土文化、培育主体认同, 却受制于基础设施与师资短板, 更受制于精神生产资料的城市中心化配置以及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 数字鸿沟正由接入层面延伸至精神生产层面, 其实质是乡村在精神生产分工中位置的落差。余村与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比较表明, 内容生命力来自本地真实故事, 而样本的可复制性依赖制度支撑。据此提出构建城乡一体化平台、激活乡土内容生产、创新共创育人场景、以制度规约技术异化四条路径, 主张以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精神生产平等为价值坐标, 推动数字思政从“为乡村设计”走向“与乡村共创”。

关键词

数字思政, 乡村全面振兴,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 城乡融合, 精神生产

Research on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mpowering th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Lianyun Zhang

School of Marxism, Nanning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September 3, 2026; accepted: October 17, 2026; published: October 30, 2026

文章引用: 张连云.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视域下数字思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10): 558-566. DOI: 10.12677/ass.2026.1510872

Abstract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mpower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represents both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Taking this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extracts three propositions: the emergence and sublation of urban-rural antagonism, the old division of labor and human emancipation, as well as the independence and subordination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These propositions are transformed from contextual narratives into operable analytical tools. The study finds that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enerates dual effects of “empowerment” and “solidification” in rural areas. While it can integrate high-quality resources, revitalize local rural culture and foster subject identity, its development is constrained by inadequate infrastructure and teachers. More importantly, it is restricted by the urban-centered allocation of means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and the usurpation of value rationality by technical rationality. The digital divide has extended from the access dimension to the dimension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which essentially reflects the positional disparity of rural areas in the division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Yucun Village and the National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demonstrates that the vitality of content originates from authentic local stories, whereas the replicability of cases relies on institutional support. Accordingly, four approaches are proposed: constructing an integrated urban-rural platform, stimulating the production of local rural content, innovating co-created educational scenarios, and regulating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through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advocates taking the two-way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and equality in spiritual production as the value benchmark, so as to advance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designing for rural areas” toward “co-creating with rural areas”.

Keywords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Marxist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piritual Produ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问题的提出

乡村全面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建设与治理已成为普遍共识。与此同时，教育数字化被确立为重要抓手，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关键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以数字思政回应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需求，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视域下实现经典理论的当代转化，成为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

围绕这一课题，学界已形成三条研究线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思政本身，研究者普遍认为转型的实质是结构性变革而非技术叠加，同时有学者对数字化进程中的“数据主义”倾向保持警觉[1]-[4]；二是数字乡村与信息赋能，相关研究以“信息可行能力”为核心概念，指出农村居民在接入可及性与使用知能性上处于劣势，数字鸿沟具有能力剥夺性质[5]；三是思想政治教育与乡村振兴的结合，既有成果多从价值引领、文化振兴、基层治理角度展开。已有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但存在三方面不足：场域上偏向高校，面向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的数字思政研究薄弱；取向上偏重技术描述与效能论证，对

数字技术背后的资本逻辑、算法权力的批判性分析不足；方法上以理论阐释与宏观数据为主，缺少扎根乡村的案例观察与机制分析。更为关键的是，既有研究尚未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系统引入数字思政研究，因而难以从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中把握数字赋能的性质、边界与限度。

在此有必要界定核心概念。本文所称数字思政，是指以数字技术为中介、以价值引领为核心，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生产、传播方式与教学关系置于数字化场景中重构而形成的新形态。就乡村场域而言，其对象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乡村学校场域的中小学生与思政课教师，属学校教育层面；二是乡村社会场域的农民群众、乡村干部与入乡青年，属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层面。本文分析以乡村学校场域为重点，同时将面向乡村社会的数字思政作为延伸对象。本研究属于理论导向的比较案例研究，经验材料主要依托公开调研报告、官方统计与公开媒介资料，研究重心聚焦经典理论命题的操作化演绎以及不同乡村情境下的机制对比，并非基于长期田野参与观察的实证研究。

与本文最为接近的是卢岚对数字化转型现实基础与行动框架的讨论[1]、吴满意等对理论内涵与实践进路的概括[2]以及赵丽涛关于范式构建的提炼[3]；胡华对数据主义叠加效应的批判[4]提示了技术应用的价值限度；吕普生虽以信息可行能力揭示了数字鸿沟的剥夺性质[5]，却未追问这种剥夺在精神生产层面如何生成与延续。既有成果的分析单位是“数字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而非“乡村场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城乡关系在其框架中往往是背景性变量而非分析性变量。本文的推进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三个命题由背景性叙述转化为操作性分析工具，并借由数字鸿沟从“接入－使用”向“精神生产”的延伸，回答既有研究未及回答的问题——数字赋能究竟在何种条件下才不至于再生产城乡支配关系。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三：视角上，将数字思政研究的场域由高校拓展至乡村，系统引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学理上，把数字鸿沟议题从技术可达性层面推进到精神生产资料占有与精神生产主体性层面；实践上，提出从“为乡村设计”走向“与乡村共创”的路径设计及相应的制度约束方案。全文沿“理论命题－当代新矛盾－案例考察－优化路径”展开。

2. 理论命题与当代新矛盾

2.1.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三个核心命题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发轫于19世纪资本主义大工业对乡村社会的冲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揭示了城乡对立的生成机制及其历史暂时性。马克思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6] (p. 184)；城乡分离既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也是私有制条件下阶级分化与劳动异化的空间表现。

经典作家并未将城乡对立视为永恒状态。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提出，“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7] (p. 265)；“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6] (p. 422)；《反杜林论》进一步指出，消灭城乡对立是消灭旧的分工的首要条件，且已成为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直接需要[7] (p. 684)。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核心并非简单批判城市对乡村的支配，而是揭示城乡关系从分离、对立走向融合、协调的历史必然性。

据此可提炼三个贯通全文的核心命题。一是城乡对立的生成与扬弃。城乡对立既非自然状态也非永恒状态，其扬弃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生产关系的根本改造为条件。二是旧的分工与人的解放。消灭城乡对立以扬弃旧式分工为前提，只有推动工农业有机结合、使劳动者摆脱职业固定化与活动片面化，人才能从历史铸造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为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提供了依据。三是精神生产的独立性与从属性。所谓精神生产，指思想观念、文化作品、教育内容等精神产品的创造

活动；精神生产资料则包括知识文本、传播平台、内容开发能力、叙事话语权等开展精神生产所需要的各类条件。精神生产具有相对独立性，又受制于物质生产条件与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思想产品的生产权与传播权分布同社会利益结构相对应。数字技术改变的是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的技术条件，却不会自动改变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结构与城乡在精神生产中的位置关系。数字思政能否促进城乡融合，取决于它是否触及并改变这一位置关系。

2.2.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当代转化与新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政策经历了从“以城带乡”到“城乡融合”的转型，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仍是需要着力破解的突出问题。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8]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回应。数字技术打破传统城乡之间的信息、资源与空间壁垒，为要素双向流动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技术条件。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看，数字技术可将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动态乃至情绪波动以数据形式体现、存储与传播，从而为决策提供基础[1]；优质思政资源可跨越地理阻隔进入乡村学校与农民生活世界，在精神文化层面推动城乡关系从“单向输血”走向“双向融合”。这种融合并非消解城乡差异，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价值共创与文化共生。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不仅是解释框架，更是批判性分析的武器。运用这一理论审视数字化转型可以发现，数字技术在弥合城乡差距的同时，也可能再生产乃至固化城乡不平等，其机理有三。其一，数字鸿沟向精神生产领域延伸。城乡居民在信息基础设施接入程度、电子资源获取机会、设备支付能力、应用意识与使用能力上均存在显著差距[5]；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鸿沟并未止于使用能力的落差，而是延伸至精神生产环节——乡村不仅较少获得优质数字资源，更少参与数字资源的生产与定义，城乡在精神生产中的分工格局被数字化形态所固化。其二，算法歧视对乡村形象的刻板化。平台经济以注意力变现为核心，流量分配机制天然偏好猎奇化、戏剧化的乡村叙事，“土味”“落后”等标签因持续获得高互动率而被算法反复加权，又经用户点赞、转发形成反馈闭环，沉淀为社会认知中的刻板印象；其实质是平台以商业逻辑替代价值判断，把乡村的形象生产权转移到流量规则手中，使乡村沦为被围观、被消费的他者。其三，平台资本对乡村价值的汲取。其典型路径是：以“赋能”名义低成本获取乡村的乡土文化、风物景观与村民生活素材，经平台加工为可流通的内容产品，再通过广告、带货、流量分成实现变现，而收益与话语权集中于平台方，乡村仅获得有限曝光与零散劳务收入。这构成一条“素材无偿占有—内容增值变现—收益外部留存”的价值转移链条，意味着数字赋能若缺乏制度规约，可能以新形式延续经典理论所批判的“城市对乡村的支配”逻辑。

3. 案例考察：赋能效应及其限度

3.1. 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基于公开资料的比较考察，选取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东部示范村)与中西部乡村学校作为观察对象，选取遵循“最大差异抽样”原则。两个案例分别代表数字思政在乡村落地时条件迥异的两种典型情境：余村代表资源禀赋优越、数字治理与研学育人已初步融合的示范村情境；中西部乡村学校代表依托国家平台实现资源普惠、却受制于能力落差的一般乡村情境。资料主要包括官方蹲点调研报告(如《余村调查》)、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公开发布的实践报道以及媒体公开资料。需要坦承的是，本文尚未开展系统的一手田野调查，案例材料属二手资料，对微观机制的解释力存在边界。据此，本文得出的相关判断更多指向机制性与方向性启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仍有待后续开展实地访谈、参与式观察进一步检验。

3.2. 余村：从“被表达者”到“表达者”

余村作为首批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其数字思政并非“设备进村”，而是把村庄真实的治理与发展过程转化为育人场景。其一，数字治理实境化。余村建成浙江省首套村级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室，将生态监测、游客流量、安全预警等数据集成于“一屏观全村”系统，问题平均处置时间由半天缩短至30分钟，实时数据经脱敏整理后成为讲解“数字乡村如何运转”的活教材。其二，发展故事场景化。《余村调查》[9]显示，2024年余村接待游客12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6000万元；从废弃矿山到矿坑咖啡(2025年接待游客突破10万人次、年营收约1200万元)，村庄20年转型的真实历程构成了最有说服力的思政文本。其三，青年共创社群化。依托全国首个乡村青年人才社区“青来集”(配备1200余个工位，已入驻企业29家、集聚青年1000余人)和“余村全球合伙人”计划(近三年落地项目60个)，入乡青年从210人增至1205人，村庄成为城乡青年对话的开放式课堂。

但深入观察也显示三重困难。一是流量的脆弱性，育人场景高度依赖文旅流量，网红业态迭代快，部分研学活动停留在“参观+打卡”层面，课程化程度不足。二是内容转化的门槛，把治理数据、生态指标转化为适切课程素材，需要既懂数字治理又懂教育规律的复合型人才，村内现有运营团队以青年创客为主，教育专业支撑薄弱。三是数据使用的规范缺位，治理数据与村民生活的数据化呈现缺乏统一的教学用途脱敏标准，随研学规模扩大，村民隐私与村庄形象保护问题逐步显现。

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看，余村的意义不在于“数字技术改变了乡村”的表象，而在于它展示了精神生产要素向乡村回流的一种现实路径。当乡村掌握了自身的叙事素材、表达工具与传播渠道，它在精神生产中的位置便由“被表达者”转向“表达者”，城乡之间的精神生产分工出现松动——2024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04年的20余万元增至220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7.4万元，乡村从被讲述的对象转变为向城市输出经验的一方，这正是“消灭城乡对立”在精神生产领域的初步落实；青年群体的常态化驻地与共创实践，也在一定范围内打破了“乡村从事物质生产、城市从事精神生产”的旧式分工格局。但同样需要批判性审视的是，余村的育人场景在相当程度上依托其独一无二的生态资本与先发品牌优势，可视为稀缺资源的租金转化而非普遍性的制度供给。若缺乏制度化的资源再分配与能力建设安排，类似的“乡村表达”可能只在少数优势村庄实现，从而在精神生产领域生成新的不平等，形成“示范村繁荣、普通村沉默”的村际落差。

3.3. 西部乡村学校：资源下沉的双刃效应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是观察数字资源下沉乡村的重要窗口，其注册用户达1.47亿，总体访问量突破540亿次，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服务体系[10]。中西部乡村学校的应用集中于三类场景：一是“专递课堂”，通过中心校教师主讲、教学点教师辅助的双师模式同步参与优质课堂；二是教师备课与研修，直接缓解乡村思政课教师“备课难”“无人可问”的困境；三是课后服务与自主学习。

但资源下沉的“最后一公里”仍然梗阻重重。据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1]，截至2024年12月，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85.3%，农村地区为67.4%，城乡差距仍有17.9个百分点，较2021年的23.7个百分点有所缩小；但基础设施的追赶并未同步带来使用能力与使用深度的均等化。实际困难集中于三点：其一，接入质量不稳定，部分山区学校带宽不足、终端老化，教师不得不“提前下载、离线播放”，实时互动价值大打折扣；其二，内容适配度低，平台资源多以城市生活为默认背景，乡村学生普遍认为“内容离自己远”；其三，使用能力不足，乡村教师数字素养参差不齐，资源应用多停留在“播放视频”层面，留守儿童家庭的隔代监护人也难以提供线上学习支持。

从效果评估看，平台对乡村教育的赋能是真实的但不均衡的。积极方面，乡村思政课的可视化资源

从“几乎没有”变为“基本可得”，教师备课时间明显缩短，部分学校借“专递课堂”开齐了此前因师资短缺无法开设的课程。但资源获得与育人效果之间并不存在自然转换：同样的平台资源，在城市学校被用于翻转课堂与项目式学习，在部分乡村学校却退化为“电子投影的灌输”，资源规模并未同步转化为使用深度。从精神生产视角看，这揭示了数字鸿沟的深层性质——国家平台显著改善了资源供给总量，却未同步改变资源生产权的分布结构：平台内容主要由城市重点学校与专业机构开发，以城市经验为默认背景，乡村学校获得了使用权却很少参与资源的定义与生产。就此而言，“使用沟”与“素养沟”并非单纯的教师能力问题，而是城乡在精神生产分工中所处位置的外在表征；旧式分工的城乡界限，正通过“内容生产的城市中心－内容消费的乡村边缘”这一新形式得以延续。弥合数字鸿沟的关键不在于继续加大资源投放数量，而在于改变乡村在精神生产链条中的位置。

3.4. 案例启示

比较两个案例可得三点理论启示。第一，内容生命力来自本地真实的发展故事，这印证了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性：数字思政的育人效力不取决于资源的技术含量与规模，而取决于其是否与乡村的经验世界相联结。第二，数字落差的本质是精神生产位置的落差。余村依托青年社群实现了“乡村作为内容生产方”，西部多数乡村学校则停留在“资源接收方”，二者差别不在设备与带宽，而在于是否进入精神生产的分工链条。第三，样本的可复制性需要制度支撑。余村模式依赖独特的生态资本与品牌先发优势，难以简单移植；对广大普通乡村而言，更需要区域性一体化平台、成本分担机制与师资培训制度等安排，把个别村庄的偶然经验转化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的稳定通道。本文案例材料以公开资料为基础，尚缺一手田野材料，相关判断的微观基础有待通过后续实地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加以检验。

4. 数字思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优化路径

4.1. 构建城乡思政教育一体化平台，重塑资源生产格局

补齐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短板是前提，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学校网络升级、智能教室、移动终端的投入，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村教育场景中的应用。在此基础上，构建区域性“大思政课”数字一体化平台，整合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乡村学校、红色教育基地、乡村振兴示范村的优质资源，形成“高校研发－平台共享－乡村应用－反馈迭代”的循环，并注重适老化、适农化设计。平台的可持续运行需要回答四个问题：一是治理结构，采取“政府主导、高校支撑、多方参与”架构，由教育行政部门、高校、县乡学校与技术服务方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明确资源版权、数据归属与收益分配规则，避免平台沦为单一主体的“资源倾销”渠道；二是内容生成与审核，建立“高校教师命题－乡村教师参与－专家双向审核－动态迭代更新”的生产链条，设立由城乡教师共同参与的审核委员会，重点审查价值导向、乡土适配度与事实准确性；三是成本分担，基础设施建设由财政专项资金承担，平台运维采取“财政保基本、社会捐助作补充、增值服务反哺”的多元筹资方式；四是师资培训，实施城乡思政课教师“数字导师制”，以“影子研修＋在线工作坊＋送教下乡”相结合的方式，把培训重点从工具操作转向课程设计与价值转化能力。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看，一体化平台建设的实质是通过制度化的技术基础设施降低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的成本，使精神文化资源双向流动而非单向倾销。平台治理结构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直接决定精神生产资料的组织方式：只有让乡村学校与乡村教师在资源生产、审核与评价中获得实质性的参与权与话语权，平台才不会沦为城市资源的新通道，而能成为城乡精神生产的连接枢纽。

4.2. 激活乡土内容生产，从“为乡村设计”走向“与乡村共创”

数字思政能否在乡村扎下根来，最终取决于它是否回应了乡村主体的真实需求。首先，建立常态化

的需求调研机制,通过入户访谈、班级座谈、问卷量表等方式摸清乡村学生、教师与村民的真实偏好,把需求清单作为资源立项的前置依据,改变“城市开发者凭想象定义乡村需求”的惯性。其次,推进内容与界面的“适农化”“适老化”改造,内容上多用乡土案例、方言讲解与短视频形态,操作上简化交互层级、放大字体图标、支持离线缓存,并设置低流量模式以适配山区网络条件。再次,把乡土知识与地方文化纳入数字资源库。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的[12],乡村学生理应在数字课堂中看见自己的村庄,也让城市学生借此理解乡土中国的价值;应组织乡村教师、非遗传承人、新农人等共同参与资源建设,将村史家训、农时节令、地方戏曲、传统技艺转化为课程素材。经典资源数字化的深层意义在于推动精神生产资料的共享化:数字化之所以具有解放意义,正在于它有可能把原本被地域与机构垄断的经典文本、解读资源与教学能力转化为可普遍获取的公共资源。因此,资源建设应以“共享”而非“占有”为原则,通过开放授权、共建共管与乡土化再阐释,降低乡村获取理论资源的门槛,使乡村从资源的“接收端”变为“生产端”。

4.3. 创新共创育人场景,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数字思政的生命力在于与实践结合。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质是人才、技术、文化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这就要求育人场景建设跳出“城市资源单向下沉”的思路。应充分发挥“大思政课”的场域优势,把乡村产业一线、非遗工坊、村级治理现场转化为可感可触的学习场景,使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理解。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探工坊·拍乡土·助振兴”一体化育人模式[13]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在机制上,学校与地方乡镇共建长期稳定的校地合作共同体,把乡村特色工坊、加工车间、非遗技艺项目转化为实景化“移动课堂”,构建起“课堂进工坊、技能助产业、成果回乡村”的育人链条;在目标上,师生沉浸式开展拍摄记录、采访创作、产品推广等全流程训练,在真实项目中锤炼本领、体悟劳动价值;在功能上,把单次实践活动升级为常态化平台,为地方特色产品提供短视频宣传、直播策划与品牌打造支持。这一模式的价值,在于把乡村从“被讲述、被帮扶的对象”转变为“共同创造、彼此成就的伙伴”。但也应看到,此类实践若缺乏数字化支撑与制度保障,容易退化为“一次性下乡”“重流量轻育人”,甚至使乡村沦为城市青年创作的“素材库”。因此,一方面应建设“云上工坊”资源平台,将工坊实景、非遗工艺流程、产业数据通过虚拟现实与数字孪生技术转化为可反复调用的教学资源;另一方面应建立由城乡教师、驻村工作队、新农人共同参与的“双师协同”教学机制,把短期项目实践沉淀为可迭代的课程模块。这一思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扬弃旧式分工、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一脉相承:它让学生在生产劳动的真实过程中完成专业训练与价值体认,打破了教育与劳动、学校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固定边界,使乡村不再是教学的背景板,而成为共同的生产主体。就此而言,育人场景创新的评价标准不应是技术的新颖程度,而应是城乡之间是否形成了真实的分工协作关系。

4.4. 强化制度规约,防范技术异化与资本汲取

数字思政的本质仍是“思政”,数字只是手段。技术理性若缺乏价值理性的规约,便会出现“重技术、轻价值”的倾向[14],其作用机理可从三个层面剖析:在内容层面,一些项目过度追求形式新颖、互动炫目,把技术展示当作教学目的,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深层阐释,手段对目的形成颠倒;在传播层面,平台依赖算法推荐组织信息流,学生的注意力被投喂逻辑所捕获,容易陷入同质化的“信息茧房”,批判性思维与价值辨析能力被削弱,评价标准由育人成效悄然滑向停留时长与互动数据;在数据层面,一些数字产品在数据采集与使用中缺乏伦理审查,学生数字画像被过度开发,可能侵害隐私、固化教育偏见。三个层面指向同一本质: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这一情形与马克思所批判的劳动

异化分享了相同的逻辑结构，即人的创造物反过来成为支配人自身的力量；需要说明的是，二者并不等同——异化劳动根源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雇佣劳动关系，而技术异化更多表现为工具理性对价值领域的越界，故此处是逻辑上的类比而非性质上的同一。据此，应把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贯穿资源开发、平台运营、教学评价的全过程：在算法设计层面嵌入内容审核机制，防止低俗、拜金、炫富等不良信息通过算法推荐给乡村青少年；在数据采集层面建立健全学生数字画像的伦理规范，明确数据使用边界；在教师培训层面将数字伦理、媒介素养、网络舆情研判纳入继续教育内容。

针对平台资本对乡村价值的汲取，还需要更具刚性的制度设计。一是建立乡村文化数字资产的确权与收益回流机制，对以乡村风貌、非遗技艺、村民生活为素材生产的数字内容，明确村集体与在地主体的权利地位，探索“素材确权-使用授权-收益分成”的制度安排，使乡村由被采集对象变为权利主体。二是建立涉农算法的价值导向评估与备案制度，由教育、网信等部门组织评估，将“是否有利于城乡平等的叙事、是否避免乡村形象的刻板化”纳入指标，并对推荐逻辑开展定期审计。三是建立涉农数据的知情同意与收益反哺机制，采集数据的范围、存储期限与共享规则应事先向村民与学生家长公开，探索数据收益的地方留成与反哺安排。四是把乡村文化表达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的支持范围，通过专项资金、公益基金等方式支持乡村自主的内容生产与传播能力建设，减少乡村对外部平台流量规则的依赖，为其精神生产的自主性提供物质条件。

需要客观看到，上述制度构想落地还面临现实阻碍：乡村文化数字资产确权缺少统一标准，村集体产权主体界定复杂；商业平台算法存在“算法黑箱”，外部审计实操难度大；基层监管与专业评估人才储备不足。因此，实践中应当区分两类举措：一类是近期即可试点推进的务实举措，包括完善内容价值审核、落实数据知情同意与脱敏机制、开展教师数字伦理培训；另一类是需要稳步探索的长远制度安排，即乡村数字文化资产确权、收益回流、涉农算法备案审计等，需要结合政策迭代逐步推进。唯有把价值引领嵌入制度设计，数字思政才能在技术层面真正落实城乡平等的价值追求。

5. 结语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分析框架，将城乡对立的生成与扬弃、旧的分工与人的解放、精神生产的独立性与从属性三个命题贯通于理论阐释、案例分析与路径设计。研究表明，数字思政的赋能效应是真实的，也是条件性的：它能够弥合城乡思政教育资源鸿沟、培育乡村振兴主体认同，但若不同时改变精神生产资料的组织方式与分配结构，数字赋能仍可能在内容生产与传播环节再生产城乡支配关系。因此，数字思政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在于资源投送的数量，而在于乡村能否由精神产品的接收者成长为精神生产的参与者与创造者。面向未来，应坚持“技术为用、育人为本”的原则，在夯实数字基础中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在激活乡土内容中推动精神生产资料共享，在创新育人场景中扬弃旧式分工、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强化价值引领中以制度约束技术异化与资本逻辑。本文的案例研究以公开资料为主，结论的普适性有待在更广泛的乡村情境中进一步检验。

基金项目

本文是 2024 年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一般项目(项目编号: 24VSZ10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卢岚.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基础与行动框架[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5): 12-19.
- [2] 吴满意, 高盛楠.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 理论内涵、核心指向与实践进路[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4): 85-91.

-
- [3] 赵丽涛.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范式构建与优化逻辑[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2): 46-51.
 - [4] 胡华. 数字思政中数据主义的呈现样态、叠加效应和纠治进路[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4, 42(6): 155-160.
 - [5] 吕普生. 数字乡村与信息赋能[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0(2): 69-79, 158-159.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8]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eqid=a18d8030000918ae00000006647fe952, 2018-01-02.
 - [9] 余村调查[EB/OL]. <https://www.qstheory.cn/20251031/ddd5ff9843584de0864ffe04f4ba626f/c.html>, 2025-11-01.
 - [10] 王嘉毅. 新形势下基础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思考与重要关切[J]. 中国基础教育, 2025(6): 6-11.
 - [11] 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s://cnnic.cn/NMediaFile/2025/0117/MAIN1737100758200NNZ5AVJ3C1.pdf>, 2025-01-17.
 - [1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 [13]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工坊课堂”创新育人模式 以职教力量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EB/OL].
<https://jyt.henan.gov.cn/2026/06-09/3364080.html>, 2026-06-09.
 - [14] 李伏清, 潘芳.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图景展现、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 中国大学教学, 2024(8): 69-76, 85.